

傅英豪和唐旦

○ 阎 明

2009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广场，鼓乐喧天，彩旗飘扬，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大庆阅兵正在进行，受阅部队在战车隆隆声中依次通过天安门广场。这时，空中传来巨大的轰鸣，空军战斗机编队开始接受国家和人民的检阅。在战斗机群的后方，首次出现了由歼-11护航的中国空军预警机编队。

预警机的出现，使空军实现了攻防兼备的战略转型，提升了空中作战体系诸要素，是解放军装备建设发展的重要成果。该项成果也受到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2010年，该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相关人员受到国家记功重奖。

在人们对解放军现代化建设日益发展而欢欣鼓舞、科研工作者接受鲜花和荣誉簇拥之时，我们不应忘记，建国后为解放军的防空雷达事业做出突出贡献、中国空

军第一架预警机的创建者傅英豪和唐旦。

傅英豪和唐旦夫妇都曾在空军工作，傅是军委空军雷达兵部主任，唐是副主任。他们是中共在战争年代一手培养的红色专家。“九一三”事件后双双被审查，从此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究其原因，源于傅英豪与林彪夫人叶群的一段陈年往事。

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对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的一次爱国学生运动，在北师院高中部就读的傅英豪是地下党员、团支部书记。在傅英豪记忆中，“一二·九”运动中，北师院附中有两个青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一个是外号叫张黑的高一男同学；另一个是初三的女生叶宜敬（叶群）。作为团支书，他在此期间发展了不少“一二·九”运动中的进步青年入团。据他回忆，叶群是在1935年末被吸收加入共青团的，当时叫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不久，接上级通知，共青团员自动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叶群是在北师院附中转为党员的，傅英豪也是那时由团员转为党员的。

当时叶群只有15岁，对中共领导的这场爱国运动倾注了满腔热情。“一二·九”运动开始后，叶群几乎天天在外奔波，很少回家。她联络同学，在街头演讲，到北京的郊区做宣传。在演讲者中，她年龄不大，却很有感染力。在控诉日本侵略者变本加



傅英豪、唐旦夫妇与女儿傅胜利

□ 人物剪影

厉地吞食中华民族的主权、国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时，叶群往往声泪俱下，无法自己，周围群众一片唏嘘。一天，叶群父亲的一个同事慌慌张张地跑到叶家对叶元恺说：“叶先生，我在外边看见你家大小姐在演讲，吓死我了，赶快叫她别去了！”客观地讲，在“一二·九”运动中，叶群也是一个积极向上的热血青年。

由于参加“一二·九”运动，叶群暴露了身份，被国民党和校方视为危险分子。1936年5月，叶群被师院附中开除学籍。叶群去找傅英豪想办法，正好傅英豪的姐姐在场。他姐姐傅玉珍是天津师范学院地下党的支部书记，受柯庆施直接领导。她对叶群说：天津师范学院有高中部，你如果想继续学习，去那报考还来得及。于是傅英豪找了一张志成中学（现北京第35中学）的空白毕业证，填上叶群的名字，并用萝卜自刻了一枚志成中学的印章盖上。叶群拿着这个毕业证明去考试，竟被录取了。

1936年秋天，叶群去天津上学。据傅英豪回忆：1936年秋末冬初，把叶群的组织关系转到了天津。此后，又将叶群的组织关系和其他去延安的人的组织关系一起转到了延安，从来没有中断过。在延安整风中，组织上对此有过明确的结论。

在叶群心目中，傅英豪是她的革命引路人，也是她的兄长。他功课拔尖，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叶群上进心强，对革命活动热情，功课又好，共同的理想使他和叶群一度情投意合，关系密切，他们一起上街演讲，一起下乡搞抗日宣传。由于叶群在学生运动中表现出色，博得了许多男生的好感，傅英豪便是其中之一。



中国首架预警机“空警一号”

这种真爱是短暂的，当时国家正在受难，最后，两个年轻人都把这份真情深深埋在心底，为自己的理想各奔东西了。之后，傅英豪考取了清华大学电机系，叶群去了天津，自此他们就断了联系。

1937年“七七事变”，学校停课，傅英豪到塘沽坐船回武汉投奔父母。因为打着平津流亡同学会的旗号，一路免票，到哪个地方换乘都有接待。傅英豪路过济南时，竟意外遇见从天津逃出来的叶群，在场的还有建国后曾担任教育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的张承先。战乱之际，没有更多的话，简单聊了几句就各奔东西，傅英豪并不知道叶群去了哪里。

建国后，大约是1964年，两人在一次工作中相遇。此时，叶群已是林彪夫人，傅英豪也是空军颇有身份的领导干部，虽然见面后两人都非常高兴，但完全是一种同志式的正常交往。在这之后，逢毛家湾放电影，叶群还请傅英豪偕夫人唐旦到家中做客，先吃饭后看电影。吃饭时因饭桌上都是些大领导，傅英豪和唐旦感到很拘谨。

唐旦和傅英豪同年出生，唐旦从小天资聪慧，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个神童。上小学、上中学就连连跳级，以致考大学时不够年龄，是备考生中的第一名。唐旦比傅英豪早一年考入清华，二人同为清华大学电机

系同学。

傅英豪在清华仍然是抗日活动积极分子，他学习好，唐旦学习也好，两人在在学校就互有好感。“七七事变”时，因日军进城无法读书，傅英豪肄业回到武汉父母身边，并与武汉地下党接上了组织关系。此时清华大学南迁，家住北京的唐旦随学校到了长沙。而清华大学又要再迁昆明，家中已无力负担她的费用，唐旦不能再跟学校走了。傅英豪在武汉广播电台当技师，唐旦得知便去武汉投奔他。傅英豪见到唐旦非常高兴，他找蒋南翔帮助，安排唐旦在《新华日报》当报务员。1938年7、8月间，日军攻打武汉，周恩来决定武汉的共产党机关向重庆转移。傅英豪和唐旦相约一起走，经周恩来同意，傅英豪也调到《新华日报》当报务员。从此，两人一起走上革命道路。

参加革命后，傅唐二人以对革命的忠诚和对事业的不懈追求，在无线电和雷达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傅英豪思维敏捷，动手能力极强。唐旦理论功底扎实，看书过目不忘，查找技术参数和公式不用翻书便能知道是哪本书里的第几页第几章，号称“活字典”。在工作中经常是傅英豪一个点子，唐旦去找数据论证，理论和实际一结合，于是难题被化解，一项发明产生了。唐旦脑子好使，但生活能力不行，生活上完全需要傅英豪照顾。因此，每次傅英豪工作调动，唯一要求就是要带上爱人唐旦。谁也离不开谁，是大家公认的“夫妻店”。

在人民解放军的技术装备发展史上，傅英豪和唐旦夫妇堪称红色专家中的绝配。据说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期间，部队大规模裁减女兵，彭总曾明确指示有两个女兵

不能裁：一个是女将军李贞，另一个就是防空军的唐旦。

1938年在武汉《新华日报》期间，为了提高收听苏联塔斯社新闻的稳定性，傅英豪为报社组装了一部四管收音机。报社从武汉撤退重庆途中，因为乘船走水路，电池特别容易受潮，为保证设备正常运转，傅英豪将电池浸泡在香油桶里，解决了电池防潮问题。

1939年，傅英豪和唐旦由武汉《新华日报》转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当时办事处使用的是一部小功率老式的哈特莱发报机，手摇发电。简易破旧，功率小，信号飘，对外联络十分困难，而且信号和国民党的电台有明显区别，很容易遭到敌台的跟踪和干扰，周恩来非常着急。傅英豪自己动手做了一个主振放大机，使电台功率倍增，信号又大又尖利，和国统区的大功率电台没什么区别。不仅保障了与南方各局和中央的联络，保密程度也得到提高，其信号还能波及东南亚。傅英豪还自己动手，用华侨赠送的一部收音机改装了一部收音机，提高了信号接收的灵敏度。

傅英豪和唐旦的才干得到周恩来的赏识，接着又推荐傅英豪去延安创办新华广播电台，并担任台长。在此之前，中共曾派陆定一的弟弟陆恒一专门去苏联学习，也带回部分设备，但回来后却因延安条件太简陋安装不起来。傅英豪克服种种困难，用树干捆天线，用旧汽车引擎、汽油桶改装发电设备，于1940年12月30日，在延安的窑洞里实现了试播，唐旦担任了第一任播音员。国民党上尉飞行员刘善本就是听了延安新华广播后驾驶B-24型轰炸机飞抵延安的。

□ 人物剪影

1943年傅英豪调军委三局通信材料厂任实验室主任，期间设计生产了15瓦“主振放大式”发报机和四管收报机，大批装备部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军观察组到延安，观察组要求我们把新华社新闻稿直发美国旧金山。在条件简陋的延安，这无疑给我们出了一个巨大难题，中央领导非常着急。傅英豪临危受命，昼夜奋战，把新华社原有的广播机器拆除，在此基础上重新设计组装了一部全新的1000瓦发报机。该机采用多级的主振放大，并研制了五个波长的V形天线，用蒸汽锅炉驱动发电控制稳定性，圆满完成任务。电台不仅频率稳定，信号还非常悦耳动听。

期间，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傅英豪为会场组装了一部50瓦扩音机，毛主席作报告时声音效果非常好，为此傅英豪荣获“陕甘宁边区模范工作者”奖状。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傅英豪向王铮提出恢复新华广播电台播音。不久张家口解放，傅英豪担任张家口电台主任，唐旦担任技师和秘书。张家口广播电台功率大，傅英豪提出，延安和张家口电台进行联播。

1949年8月12日，担任电信总局技术处军用机组组长、军委通信部技术处处长的傅英豪正在向部长王铮汇报工作，桌上的电话响了，是周恩来打来的。周恩来说，我们准备召开大型的政治协商会议，地点选在中南海怀仁堂。这是共产党第一次做东道主，请全国的民主人士来北平开会，成立自己的国家，一定要搞好。可是现在怀仁堂的声音是个大问题，因为麦克风的“风”吹不到远一点的角落。周恩来接着说，

民主党派对山沟里打出来的共产党有一种说法，打得了天下，管不了天下，“土包子”没有管理国家的能力。显然，他们对共产党不服气。我们政协会议的内容再好，人家听不清楚你说什么，这个会议就是失败的会议。因为声音不清楚影响会议，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王铮放下电话对傅英豪说：“这个任务自然是你的了，有没有困难？”傅英豪在延安时就是王铮的部下，只要沾电的活儿，王铮都统统交给傅英豪。傅英豪从不正面回答有没有困难，他到现场勘查，无论喇叭安在哪，都解决不了回声问题。离开会还有不到两星期了，他绞尽脑汁，终于用化整为零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难题。人民大会堂建好后，声音扩散方面同样存在缺陷，周恩来同样指示傅英豪解决了这一问题。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上讲话的扩音器、朱德总司令检阅车上与扩音设备的连接装置、天安门广场的升旗设备都是傅英豪研制的。

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总部无线电联络不稳定，信号经常中断，为此傅英豪研制了“高射天线”以解决问题；入朝部队坑道作战被美军炮火压制与外界通信联络困难，傅英豪和唐旦紧急研究出“铺地天线”和“行波天线”，与步话机结合使用，解决了坑道作战通信问题。

在军用通信事业上，傅英豪、唐旦曾是通信先驱王铮得力的助手。1955年组建防空军，防空军司令杨成武调用傅英豪和唐旦，王铮就老大不高兴，死活不愿意。1957年空防合并，傅英豪被周恩来亲自任命为空军雷达兵部副主任、主任。

空军成立雷达兵部后，空军所有雷达

基站的选点、雷达站的技术参数和管理条例都是由他们两口子制定的。那些年，傅英豪和唐旦上高山下海岛，跑遍祖国的山山水水。他们几上唐古拉，高原反应使傅英豪鼻孔流血不止，他硬是抱着氧气瓶坚持工作。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空军的雷达网络是他们俩搭建的。如果王铮是军队“通信兵之父”的话，傅英豪就是当之无愧的“雷达兵之父”。他们的女儿曾对笔者说：原来家里还有父亲抱着氧气瓶工作的照片，只可惜“九一三”后抄家，都遗失了。

在打击美制高空侦察机 U-2 时，由于敌机加装了预警设备，我地空导弹部队只要开机敌机就会报警，部队几次失去战机。空军司令刘亚楼很着急，命令傅英豪马上拿出办法，否则提着脑袋见他。傅英豪利用现有装备，研究了一套克敌制胜的办法。他针对问题，让地空导弹部队先开启发射装置的低压开关为导弹预热，使导弹处于待机状态。敌机航路由远程警戒雷达报坐标，待敌机进入我导弹射程，突然打开高压，战斗部在几秒钟内锁定目标将导弹发射出去，敌机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就被击落了。用这样的办法，我们连续击落了五架敌人的高空侦察飞机。据有关资料统计，全世界被地空导弹击落的高空侦察机一共七架，我们就占了五架，从此台湾方面和美国人彻底放弃了对中国大陆的高空飞机侦察；傅英豪和兼任空军第二研究所所长唐旦研制出解放军第一部相控阵雷达，提高了雷达的预警等级。

中苏珍宝岛战役后，为防止苏联导弹威胁，傅英豪向中央军委提出以“常规雷达看导弹”的建议（包括雷达跟踪多弹头导弹），得到中央批准。他们研制出几种

改进雷达，并多次参加导弹的试射检验，完善了军队的雷达警戒系统。

1970 年，傅英豪接受中央军委命令，与唐旦等科研人员研制出第一架雷达预警飞机样机“空警一号”。“空警一号”以“图-4”作为预警机平台，主要系统涵盖雷达、数据处理、数据显示和传输、导航和引导、电子对抗等。据资料显示，“空警一号”对低空目标探测面积已相当于 40 个 $\Pi-30$ 雷达站，并可覆盖许多雷达盲区，在防空上非常有实用价值，与当时的美、英、苏、法四国同步，被誉为中国空防史上的里程碑。“九一三”事件后，这些科研项目因为是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时进行的，被封存搁置。

“九一三”事件后，傅英豪夫妇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两人被审查了近七年，被开除党籍、军籍、公职，多次被抄家。抄家时，书架被推倒，业务书散落一地。专案人员每本书都不放过，一页一页翻查，仿佛能从技术资料的字里行间查出他们的反党依据。随后，他们被遣返回傅英豪河北青县老家自食其力。到青县后，汽车把他们的行李扔到路边就开走了，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最后找到生产队给解决了两间破土坯房。老两口都已六十多岁了，懂雷达却不懂种地，怎么去自食其力？只能靠两个孩子每月节省下的粮票买粮度日。

在农村呆了五年，实在没办法生存，老两口回到北京，和儿子挤在一起。儿子房子不大，两间小房，孙子已到结婚年龄，傅英豪只能在小阳台上搭块木板栖身。那时的傅英豪又黑又瘦，人整个脱了相。

回北京还有一个原因，傅英豪没有生活来源。孩子们生活也不宽裕，夫妇两人

□ 人物剪影

省吃俭用，靠给别人修理家电挣饭钱，也为孩子减轻点负担。为了给老伴解决缝补困难，傅英豪为唐旦发明了一种手动缝纫机，像订书机似的。有一阵子，北京的农贸市场经常有老乡在摆地摊卖这种手动缝纫机。人们不会知道，这种机器的发明人，是出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无线电专家、“雷达兵之父”傅英豪之手！

空军给他们的审查结论主要有三条，第一，曾介绍了叶群这个假党员；第二，曾向当时的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汇报过工作，并给林立果看过雷达部署图；第三，曾吹捧过林彪。

傅英豪曾申述过，1983年经空军重新复议，他被开除党籍，从行政9级降为13级；唐旦恢复党籍，由10级降为12级，两人都交地方安排。这样的戴罪之身和这把年

纪，地方怎敢接收？后来傅英豪曾通过老关系想入职清华大学和社科院，空军又不同意。最后到死，老两口都挤在孩子家里。

老两口的一些作为至今让子女们百思不解。傅英豪出狱后抱着女儿傅胜利痛哭道：“党不要我了！”唐旦生活最艰难的那些日子里，还要把省下的钱交党费。

1994年9月23日，傅英豪突发心脏病，因救治不及时去世，时年78岁。女儿说，父亲平时很注意锻炼，常年坚持游泳，身体一直不错，如父亲有起码的医疗条件，是不会死的。女儿还说，父亲去世时，眼睛始终睁着，怎么抹都不闭上。几年后，母亲也随父亲去了，父母生前没有给我们留下一分钱、一片瓦。

（原载《老照片》第97期，
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年10月）

传奇文史大家卫聚贤

○散 木

卫聚贤(1899—1989)，字怀彬，号介山，又号卫大法师，山西万泉人。

卫聚贤是民国著名学者，其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亦堪为其时学界之一怪。他拔起于逆境，以自学出身，终有志者事竟成，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得王国维等亲炙，后以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鸣世，著述颇丰，且是学界中的组织者，但以其所论多怪异，研究方法又不同常人，加上他后来离开大陆，于是更为人所罕知。今天，已经没有人知道他了，于是他几乎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学界的一块“化石”了。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怪才

卫聚贤太原读书时原本亦热心于社会活动，后以参加学生会活动失意，转而钻研古史，又索性中止学业赴北京投考师大历史研究所，却因该所从不招收外校学生而罢，他遂在师大旁听，兼在私立新闻大学就读。1926年，他又投考其时中国第一流之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而此时卫聚贤并无一张正式文凭可以出示。考试时，史学泰斗王国维先生观其作文题目为“春秋战国时代之经济”，问其做该题取何材料？答以《国语》、《左传》；